

编者按:

教育发展要紧扣时代命题。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教育管理领域仍面临诸多亟待破解的理论与实践难题,亟须广大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携手同行、共同破题。本期探讨——

教育强国目标下的教育管理创新

□张天雪 王曦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十五五”规划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议事内容。此前,教育管理已从经验管理迈向科学管理,基本完成了1.0阶段的变革;如今正在进行范式转型,向2.0现代教育治理迈进。如果说,上一阶段追求的是教育管理的科学性、人本性,那么接下来的教育治理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对教育强国建设的支撑性和创新性。

一、注重政治领导

在教育强国的战略背景下,政治领导的核心在于党的领导地位不容动摇。“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这一理念不仅是我国教育发展的基石,也是实现教育强国的关键所在。管理具有二重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现代教育管理的政治领导,就是贯彻《教育强国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的“政治属性”的显性表征。高校是国家培养高级人才和推动科技创新的主阵地。高校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机制建设和效能保障,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方面站在前列,走在前头。基础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的根基,肩负着培养下一代国民的重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让学生不仅要学会学习,更要学会做人。确保党对学校的领导覆盖各个领域,完善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从试点逐步推广至全面实施。民办学校要确保办学方向和教育内容符合国家政策,特别是在办学理念、师资队伍建设、学生思政教育等方面,要与公办学校保持一致。

二、加强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是国家各项战略实施的核心。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要求完善教育治理结构,强化教育管理的法治化、推动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强教育质量监督与评估和推动教育管理的创新与开放。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就是教育系统编制各级各类“十五五规划”的指南。各级各类教育管理单位、学校都是连贯而又各具特色的子系统,各子系统

教育强国进程中教育管理的新特征

内部同样要加强各自的顶层设计,强化愿景管理,突出我国改革中“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的体制、机制和策略优势。在教育强国的框架下,顶层设计不仅要考虑各级教育的具体需求,还要规划未来教育体系建设,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使其具备整体性和协调性。

三、关注民生需求

现代教育管理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是“投资于人”的突破,需切实关注社会各阶层的需求,尤其是教育资源配置的普惠性、公平性和普及性,增加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现代教育管理切实关注群众具体的需求,推动多样化的普惠性教育,就是贯彻“人民性”的显性表征,是对“教育为人民服务”的有效落实。对于教育管理而言,应加强基层的调研,形成全员参与的教育共同体,办好每一所学校,满足人民对美好教育的期盼,缓解教育内卷,建设良好教育生态,确保“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强心健体、业有所就、老有所学”成为学习化社会的标配。

四、强化数智治理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数字化、智能化管理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数字中国”战略实施为创新教育路径、重塑教育组织形态、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强化数智治理,就是要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教育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实现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发展。数字技术在教育管理中的应用,能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智能平台可实时监测和评估教育发展情况,为决策提供实时数据支持。通过学习管理系统和教育平台的推荐功能,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制订个性化教学方案,提升学生学习效果。此外,教育管理者还可利用数据分析,准确识别教育资源的分布和使用情况,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教育的整体效能。通过这些技术手段,教育管理不仅能提高管理效率,还能促进教育公平,确保优质教育资源能够精准地触及每个学生。

五、鼓励试错创新

现代教育管理鼓励科学化、创新性

和包容性改革,推动教育体系的高质量转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管理应依托科技手段提升决策精准性,通过数据分析和智能平台优化资源配置。同时,教育管理应鼓励创新,支持基层学校和教师探索新的办学模式、教学方法和灵活的管理模式,推动教育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在创新过程中,容忍适度失败是必要的,“摸着石头过河”是我们长期形成的方法论。教育管理应建立反馈机制,通过总结与反思不断改进方案,在政府治理方式、学校治理体系、教共体合作模式、教育教学组织形式与教学内容方法改革方面推陈出新。管理者应支持教育工作者提出符合本土实际的创新方案,最终推动教育强国建设,提升教育质量和创新能力。

六、跨界联合共管

跨界联合共管是教育现代治理的重要趋势之一,意味着教育管理不再局限于单一部门或学科的管理,而是通过多部门联合、多主体协同、多模式探索、多路径前行,使管理成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重要推手、抓手。跨界联合共管模式强调教育的多元化与合作化,鼓励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教育资源配置与教育创新。教育管理不仅依赖于政府,还需要企业、社会组织和科研机构等各方的广泛参与。通过政校合作、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家校社教共体建设,各方能够提供不同的视角与资源,推动教育体系的灵活性与创新性。教育管理可通过建立更为开放的沟通平台,促进家长、社区和社会机构参与到教育决策和管理中,使教育的质量和公平性得到更好保障。通过跨界联合共同成长的模式,我们可以实现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提升教育的整体效能。

建成教育强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在承上启下的“十五五”阶段,现代教育管理应聚焦政治领导、顶层设计、民生需求、数智治理、创新发展和跨界联合共管等方面,持续推动教育管理从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转型,支撑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作者分别系浙江师范大学高质量教育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研究生)

阅读背景

近日,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现代教育管理专业委员会2025年学术年会在浙江师范大学举行。会议聚焦教育强国目标下的教育管理理论创新与实践路径,旨在通过深入研讨,为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治理体系提供学术支撑,推动数智赋能、教师发展、资源配置等关键领域的突破性探索,以高质量教育研究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打破“指标枷锁”,服务国家战略

□康 宁

在教育公共治理上,要处理好为国家战略服务与为教育指标服务的关系;在教育阶段规划上,要处理好教育“慢”变量与服务“快”变量的关系。

我国教育管理在党的领导下,正由集中行政管理向现代公共治理方向过渡。这一演进脉络表明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既要背靠国家发展战略,又要紧密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

当前的国际局势与国内发展战略需要教育全力服务大局需求。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有差距,表现在高等教育适配国家产业转型与科技强国高质量人才需求方面的不足等。在微观层面上,管理导向牵制的最大公约数是各类评价指标,整个教育体系的所有微观表象正在向各种指标看齐,并被指标束缚。面向“十五五”乃至更长远的发展,我们必须勇于打破“指标枷锁”,推动教育发展彻底回归服务国家战略的根本宗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副会长)

以教育治理研究代替教育管理研究

□孙锦涛

要关注“为何转向治理”“何为治理的本真内涵”“如何构建治理体系”三大核心问题。

有学者认为,教育治理理念不同于传统教育管理,它是各个要素之间的互动。教育治理既要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又要维护受教育者的利益;强调政府同学校间建立契约精神;强调民众参与教育治理,教育治理过程就是教育民主化过程,在治理过程中各方共同参与,通过对话、协商、讨论等形式达成共识。

有学者指出,教育治理是对传统教育管理模式的扬弃,它是指多元主体在一定的组织架构和制度框架安排下,共同参与教育公共事务,协同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实现教育由共治到善治。现代公共教育治理的实质就是强调多元利益主体对教育内部事务的共同治理,其典型特征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治理,即“共治”,其本质是处理政府、市场、学校、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参与关系。教育治理的核心是教育权利结构的调整,即“多中心治理”“简政放权”“技术治理”“依法治教”“线性治理”等,其本质上都是作为组织系统的政府在结构上的优化策略,包括调整教育权力(权利)、责任(义务)及其行使主体、呈现手段、活动依据和具体内容等。

对西方和中国治理原意的考察发现,治理的原意包括“管理和疏导”两方面的意思。“管理”包括管控、统治等多方面的含义,而“疏导”与平等协调、多元治理等有关。所以,如果将治理的原意加以细化,治理就包含了管控、统治和平等协调、多元治理两方面的内容。

从治理与管理的关系来看,治理也是一种管理,但这种管理强调组织与组织、组织与个人的调解联动及其过程,并以多元的形式,以共赢和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来行使权力,共同管理相同的事务。可见教育治理是通过管理和平等协调、多元共治来做好教育事务,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而完成教育任务的一种现象。

新时代教育管理应超越传统的思维定式,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构建一个统合科学管理、平等协调与多元共治的复合型教育治理体系,从而推动学科在理论范式与实践逻辑上实现根本性创新与自主性发展。

(作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现代教育管理专业委员会创会理事长)

□张新平

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必须得走世界共通选择的教育强国建设之路。教育强国型领导力是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的关键因素,具有愿景性、战略性与政策性三大特征。

愿景性是一种以未来观当下,用未来图景和理想追求来鼓舞、形塑当下的领导力。愿景通常都不是特别具体明确的,而是较为抽象甚至具有明显的模糊性。但正是这种抽象性和模糊性,表现出强烈的吸引力和认同性。教育强国型领导力具有未来导向品质,既要着眼于具体的领导目标与任务,又不能为

现实的目标任务所局限。领导者要站得高、看得远,要充分发挥领导者的精神感召作用。

战略性通常是一种对于事物发展的整体性和全局性把握,是对事物发展根本目的和方向的正确判断与选择。教育强国型领导力表现出明显的战略性特征,是以发展为导向的,注重中长期的规划设计,突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成长性、持续性、关系性和系统性。

政策性从形态上看通常表现为一套由权威主体颁布的旨在指导行动的方针、方案或文本。政策性赋予决策与行动的合规性和稳定性,是现代教育治理的重要表现形式。教育强国型领导力的政策性特征,具有较明显的公共性、权威

呼唤教育强国型领导力

从资源配置的管理走向文化共生的领导

□刘莉莉

中国教育管理的演进,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转移:其核心是从以资源配置为中心的管理,迈向以文化共生为旨归的领导。这一转变绝非简单的术语更迭,而是领导哲学与实践逻辑的根本性重塑,标志着教育治理现代化进入了新阶段。

传统的资源配置的管理范式,根植于经典科学管理理论。它将教育组织视为一个追求效率的机械系统,人、财、物被量化为可置换的资源。管理者的核心职能是通过计划、组织与控制,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其目标是标准化产出与规

模效益。这种工程思维在特定历史时期为教育体系的快速扩张与规范化提供了保障。然而,其内在局限也日益凸显:将复杂的教育实践简化为从投入到产出的技术流程,忽视了学校作为文化场域的本质,易导致组织的僵化与创造力的窒息,最终陷入千校一面的同质化困境。

文化共生的领导范式汲取了文化组织理论与复杂性科学的思想精髓。学校并非冰冷的机器,而是一个由制度文化、教师文化、学生文化及社区文化等多元主体构成的、动态演化的文化生态系统。在此视域下,领导者的角色从资源分配者与流程控制者转变为生态的培育者与意义的促成者。

性、强制性,突显行动标准、准则、规范在教育领导工作中的优先性。

教育强国型领导力的价值必须在处理复杂关系中实现统筹与平衡,系统协同好“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育强国建设”,在“人民至上、公平优质、系统协同”的价值引领下形成合力;正确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坚守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与战略属性这一根本;辩证把握好教育体系中的“强”与“弱”,以富有韧性与柔性的领导艺术,激活教育组织内生动力,扎实推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现代教育管理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这一新范式的实践路径体现为:首先,从“指令”走向“对话”。领导者不再依赖行政命令,而是致力于搭建跨文化的对话平台,促进不同价值观念的理解与融合。其次,从“标化”走向“赋能”。领导者的工作重点不再是确保执行统一的规范,而是通过创设信任、包容、安全的组织氛围,激发每一个主体的内在潜能与创新勇气。最后,从“管控”走向“服务”。领导者的核心任务是“培育土壤”,即为各种文化形态的健康生长提供必要的条件、资源与空间,使多样性成为组织活力的源泉,而非冲突的根源。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副主任)

管理新范式:数字赋能的协同治理

□李鸿鑫 杨聚鹏

面向教育强国建设,中国特色教育管理应构建“数字赋能—多元协同”的治理新范式,这是破解教育结构性矛盾、实现“以治促强”的核心路径。这一范式应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为基本遵循,深度融合教育的政治属

性、人民属性与战略属性,重构治理逻辑与实践路径。其核心要义在于双重赋能:一方面依托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教育数据中枢,打破信息孤岛,实现资源配置、质量监测、风险预警的精准化决策,推动治理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另一方面突破行政化窠臼,构建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多元主体共生体系,通过纵

向联动与横向协同形成治理合力。这一范式既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统筹优势,又契合教育数字化战略要求,通过“技术—制度—主体”的协同演化,助力破解城乡教育均衡、产教融合等关键难题,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高效能治理支撑。

(作者杨聚鹏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鸿鑫系硕士研究生)



扫一扫,关注“浙江教育报 前沿观察”
微信公众号,了解教育前沿观点